

孫中山先生與台灣

王成聖

國父五次來台考

國父逝世臺胞震悼

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晚間七時，大雨滂沱，天色如墨，台北市出現一個悲愴肅穆，感人至深的場面。時為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二日後，台北市民在日據台灣總督府的多方杯葛，限制壓迫之下，不顧身家性命的危險，公開舉行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追悼會。當時，大批日警便衣密佈會場內外，緊密戒備，如臨大敵。日據台灣總督府裡緊張萬分，一道的頒下禁令：不許誦讀唱詞，不許奏唱輓歌，不許發表演說，必須如何如何……。

愛國僑胞竭力交涉的結果，僅祇獲准懸掛中山先生遺像，與祭人士可以向遺像鞠躬行禮，並且推人報告中山先生一生行誼。

在這一天下午七時整，竟有五千位台北市民面容哀戚，心情沉重的冒雨前往致祭。不顧日警便衣的虎視眈眈，有三千位市民僥倖擠進了追悼會場，兩千位市民默默的撐着雨傘，肅靜無語

的屹立於傾盆大雨之中。這一次祇准報告中山先生行誼的追悼大會，從晚間七時進行到深夜十時，寒風撲面，街心積水，兩千位緘默的致哀者，沒有一個人離開。

在被日據台灣總督府禁讀的唱詞中，有如下一段，——足以代表當年三百萬台胞悲痛的心聲：

「唉！大星一墜，東亞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四萬萬的國民，此刻爲了您逝世哭喪了臉了。消息傳來，我島五內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泉滔滔了！」

在李震明所著「台灣史」一書中，曾經指出：

「光復台灣爲中山先生革命政策之一。……當時活動者以興中會爲中心。該會曾提出恢復高台，鞏固中華之口號。高指高麗（朝鮮），台指台灣。」

台灣耆彥，前台灣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在孫先生九十誕辰論文集集中所寫的「國父與

台灣」一文內，曾說：

「當乙未（一八九五）讓台之前，國父雖已決定革命，然而還上李鴻章『萬言書』陳救國大計。這事雖然不能看作與清廷妥協的行爲，但不能說是絕對沒有寄望於清廷的意思。及至乙未讓台後，繼興中會之設立，又有乾亨行、農學會等之秘密機關組織。這時國父革命意志之堅決，及行動之積極，實非以前可比。事實上，那時之革命已走上實際行動了。」

其實，中山先生親撰的興中會成立宣言，開宗明義，即以甲午戰敗，乙未割台爲殷鑑，無比沉痛的說：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隳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

又如 中山先生親撰之「農學會緣起」，也曾有謂：

「我國衰敗，至今已甚，用兵未及經年，全軍幾致覆沒。喪師賠款，蒙恥啓羞，割地求和，損威失體，外洋傳播編成笑談之資。……」

由此可見，中國國民革命之興，中山先生自決心從事革命以至付諸實行。甲午戰敗，乙未割台，乃一最大的刺激因素。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在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孫先生建黨革命八十週年紀念日所發表的公開演說中，曾特別強

調：

「八十年前，本黨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之時，亦正是甲午第一次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岌岌可危之時，由於戰敗的結果而割讓了台灣給日本，乃加速了本黨第一次革命運動於是年在廣州的爆發，更屬顯然。」



民國十三年冬十一月，孫中山先生偕夫人自台抵日，在神戶登輪時留影

因此，當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北平。在北京大學就讀的全體台灣學生，即曾以北大台灣同學會的名義，撰了如次的一副輓聯：

「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
微先生何人領導！？」
四十年祖國未竟志業，
我輩其誰分担！？」

台民一致効忠

祖國

民國十五年 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日，台灣革命青年團曾經發表了一篇：「敬告中國同胞書」，原件早已蕩然無存。只有日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載有一篇日文譯文，現特予逐譯為中文如次：

「偉哉 孫中山先生，同為東方弱小民族的台灣同胞，雖然

也和中國大陸上的同胞同祖同宗，可是他們所受的痛苦，以及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欺壓蹂躪的慘況，却遠超乎祖國同胞若干倍。祖國現已進入革命發展的初期，我台灣同胞即應認清時代與潮流，急起直追，來參加祖國的革命。我們每想念及台灣，便會聯想到我們的總理。他雖然已經逝世，但是他的偉大精神，仍在繼續指導東方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總理逝世的三月十二日，是我中國民眾永不能忘的日子。同時，我們也希望絕對不要忘記一八九五年甲午之役所失去的台灣！……」

台灣革命青年團「敬告中國同胞書」後，還附有幾條宣傳標語口號，是為：一、毋忘台灣！二、台灣民族就是中華民族！三、台灣土地就是中國土地！四、孫中山先生精神不死！五、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自以上所列的珍貴史料，可以很明確的看得出來，中國國民革命與台灣有其特殊的淵源。淪於日閥佔據之下的台灣同胞，對孫中山先生，更有着由衷的敬愛，與無比的忠誠。民國十四年北大台灣同學會輓中山先生聯中的「四十年祖國未竟志業，舍我輩其誰分担！」一語，無異莊嚴神聖的誓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灣同胞以虔誠的心情，鄭重立誓，接受了中山先生的臨終遺囑，慨然引未竟全功的祖國革命大業為己任，誠足以令人深切感動。

至於中山先生之重視台灣，對台灣同胞有格外深厚的感情，則在中山先生的一生事迹之中，在在能够獲其端倪。自民前十二年庚子（一九

〇〇），以迄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一月中山先生北上會商國是，其間曾經五次到過台灣。其中第一次尤關重要，因為中山先生曾在台北成立惠州起義總機關部。台北因之成為惠州起義的司令塔，在中國國民革命史上佔據一頁極重要的地位。

中山先生第二次來台尤曾一住月餘，和台灣革命同志接觸頻繁。第三次及第四次僅匆匆到台北一宿，翌日即赴基隆登輪駛往日本。第五次更是所搭輪船僅在基隆港外稍作停泊，以致未克上岸。

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黃季陸發表「革命建國運動與台灣」一文，指出孫中山先生在民國七年六月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務以後，在由穗東渡途中第三次到達台灣，使中山先生究竟兩次蒞台，抑或三次、四次蒞台之說又有新的發展，深切引起多方興趣。不過，黃氏文中亦謂：「中山先生這次（指第三次——筆者註）到台的經過，目前所獲資料並不多，記載最詳要算戴季陶（傳賢）先生民國十六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台灣青年的演講。在講詞中曾說到中山先生民國七年台北之行的用意。」

黃氏並摘錄戴氏講詞中的一段說：

「民國七年時我們的總理孫先生因為在廣東革命失敗，離開了廣州，第一步先到汕頭，然後經由台灣轉赴日本，這時我們的總理有一個計劃，就是到台灣，想和台灣同胞見面，發表他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舞愛國

精神。我們的總理抵達台灣的時候，台灣同胞非常高興，很想要表示熱烈的歡迎，可是日政府，台灣總督府，拒絕總理和台灣同胞接近，……」

戴傳賢氏還提到日板垣退助為民權自由運動發起台灣同化會而被日本政府趕走的事，他說：「由此可見日本政府不僅不准台灣的民眾和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接觸，並且對同情台灣的日人，也不許他們留在台灣。」

照黃季陸的說法，中山先生蒞台，前後當為四次。中山先生屢次蒞台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極關重要的一頁，因特廣蒐史料，遍訪相關人士，加以考證。筆者研究的結果，發現中山先生來台前後共有五次之多，史料斑斑可考，不容置疑。謹撰本文，以就教於高明。

在台指揮惠州起義

中山先生第一次來台，時在公元一九〇〇年庚子七月，其詳細經過是——：

民前十二年（公元一九〇〇）七月十七日（陰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停泊在香港海面之日輪佐渡丸，一間寬敞的艙房裏，正舉行一次歷史性的會議，參加者有與中會重要人物楊衢雲、陳少白，効忠中國革命的英國志士摩根、日本志士平山周、宮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福本誠、原植等人。居中而坐的是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孫先生這一年三十五歲，自東京過香港、西貢抵達新加坡，再從新加坡折

返香港來。因第一次廣州起義不成，港府循清廷之請加諸於孫先生的放逐五年命令，還差兩個月方告滿期，孫先生不克在港登岸，祇好在香港海面，日本輪上，和與中會的重要幹部會晤。

在這一重要的會議上，孫先生以他睿智的眼光，與堅定的態度，否定了香港同志策動兩廣總督李鴻章獨立的獻議，確定了繼續進行武力革命的方針大計，孫先生即席宣佈：

「我們決定在廣東惠州起義，由惠州向東部沿海地區推進，直抵廈門。這一次起義以台灣為聯絡指揮的中心地點。」

因此，庚子（一九〇〇）惠州起義，係以台灣台北為總部所在地。但在中山先生抵達台北以前，發號施令處仍設於中山先生行在，日輪佐渡丸上。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海面日本輪上主持會議後的次日下午，陳少白乘舢板登佐渡丸，向中山先生報告：「李鴻章抵港，上午十一時與港督會晤，拒絕港督促李獨立的建議，旋即返回廣州。」中山先生乃在佐渡丸召開第二次會，指定惠州起義的負責人選計：

總司令 鄧士良
參謀長 原 楨（日籍志士）

財務部長楊衢雲（兼赴內地聯絡會黨參加起義）

民政部長畢永年
外交部長平山周（日籍志士）
香港總機關 陳少白、楊衢雲、李紀堂（經

理工作）

赴穗籌組秘密機關負責人 史堅如、鄧蔭南

一個月後，舊曆八月下旬，中山先生派平山周等相率赴台預為佈置，旋攜日籍志士山田良政、宮崎寅藏等蒞臨台灣。當時的日據台灣總督是兒玉源太郎大將，民政長官為兒玉總督的好友，醫師出身的後藤新平。兒玉和後藤向對中國革命表示同情，尤對中山先生表示崇敬。及知中山先生抵台，兒玉即指定後藤為其私人代表，隨時與中山先生保持密切聯繫。

中山先生抵台後先住台北長房號，不久即在新起町（即今長沙街一帶）租了一幢房屋，作為惠州起義指揮總部，中山先生和宮崎都在指揮部住宿。

台北總指揮部的主要工作，在發號施令，籌措軍械，並招募軍事人員，充作革命軍的基本幹部。在總指揮部成立以前，惠州起義革命軍司令鄧士良，先已集合了七百餘名英勇的革命同志，在惠州三洲田待命。舊曆閏八月十五日，中山先生自台北發出立即舉事的命令傳抵前方。鄧士良遂於當夜親率敢死隊員八十名，襲擊沙灣。是夜，革命軍高聲喊殺，斬斷軍旗，清軍猝不及防，無心應戰。在革命軍凌厲直前的攻勢之下，土崩瓦解，東逃西散。沙灣光復，清軍潰散無餘，這是與中會成立以來，革命軍所獲得的第一次輝煌勝利。捷報傳出，舉國同胞歡欣鼓舞。清廷為之大震，廣東總督滿人德壽尤其倉皇失措，羊城一日數驚。

坐鎮台北指揮軍事

很不幸的，革命軍總司令鄧士良因沙灣之捷，臨時更改既定戰略，因為他事先不曾料及攻克沙灣會那樣容易，沙灣是惠州府新安縣的一個村落，但却是三洲田通往廣州省城的一道要隘。由沙灣出東江，可以直達廣州。於是鄧士良改絃易轍，他亟於再克新安，逕下羊城，以佔據廣東一省的心臟之地。

沙灣奏捷，革命軍終於有了一處根據地，革命同志聞風而起，爭相投效。在短時間之內，沙灣一軍從八十人迅即擴充為六百人。此外平山、龍岡各地聚集的革命黨及會黨人士尤有一千餘眾。因此鄧士良在積極部署進攻廣州時，便在新安和虎門一帶，埋伏了一支接應部隊。

鄧士良臨時改變進攻路線，與中山先生的既定策略恰好背道而馳，中山先生命鄧士良在惠州起義後旌旗東指，用意在打通粵閩通道，光復廈門，以便接應。中山先生自台赴廈，親自指揮前線軍事。更重要的還在於軍械接濟問題，因為菲律賓的獨立軍領袖阿奎納度，曾經密遣代表彭西赴日晉謁中山先生，請中山先生在日本代為購辦軍械，第一批在運菲途中因日輪布引丸失事，全部沉沒。第二批則因日本政府警覺，予以嚴密監視，而貯存於東京大倉會社倉庫，遲遲無法運出。迨菲島獨立戰爭失敗，彭西即慨然應允，倘中山先生在中國發動起義，即將所有軍械撥歸中國革命軍使用。攻佔廈門港灣，革命軍即可獲得大量軍械的接濟。所以惠州起義戰略之

釐訂，中山先生是盱衡全局，兼籌並顧的。

惠州起義之前，中山先生先已指派宮崎寅藏自台赴日，負責啓運菲律賓存日軍械，由日本運往廈門。及至中山先生初聞捷報，當即致電宮崎，促其儘速辦理，並透過後藤新平，與兒玉源太郎洽商，促請兒玉撥借一批軍械資助革命軍。當時，由於日本首相山縣有朋素重孫先生的為人，兒玉已有允意。

中山先生一面籌措軍械，一面通知鄭士良，照原定方略，進兵廈門。鄭士良奉命後立即揮師東向，在革命軍未經訓練，軍械彈藥嚴重缺乏的雙重困難之下，憑恃革命精神與高昂士氣，閏八月二十二日再捷於佛子坳，二十四日三捷於永湖，一路順利推進。二十六日進抵白芒花，崩坎坳，距離粵閩邊界，已在不遠。不幸在崩坎坳與大隊清軍隔岸對壘的二次激戰後，雖將清軍擊潰，可是革命軍的彈藥幾乎打光了，鄭士良迫於無奈，唯有率部退回海豐縣三多祝，加以整補。

綜計自閏八月十五日，奉台北總部命令發動起義以來，鄭士良率六百餘位同志，憑三百隻洋槍，每槍只有三十粒子彈，即能轉戰數百里，迭克諸要隘，四戰四捷，保持全勝紀錄。確是中國革命史上，轟轟烈烈，可歌可泣之一役。

自閏八月二十六日，革命軍因彈盡糧竭，迫不得已退回三多祝以後，設在台北新起町的革命軍總指揮部，接二連三的遭到意外的打擊。首先是宮崎寅藏從日本致電中山先生，報告他經由中村彌六之手，所購存的那一批菲律賓獨立軍

的軍械，也不知是中村設局詐騙，還是存在大東會社倉庫裏被人掉了包，赫然變成了一批廢鐵，無械可運。中山先生聞訊，悲憤交集，深心痛苦不堪。祇不過鄭士良敗退三多祝的消息猶未傳到，中山先生為前方千數百名浴血苦戰的革命同志計，只有勉抑悲痛，振作精神，繼續致力於兒玉源太郎接濟軍火的一線之望，一再商請兒玉從速撥借，以應燃眉之急。同時，中山先生百折不同，鏗而不舍的精神意志力量，也感動了不少日本軍官，他們見義勇為，奮袂而起，志願投效。中山先生麾下，決心成為中國革命軍之一員。

政情忽變外援難期

不幸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台北市革命軍總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閏八月底，日本內閣更迭，山縣有朋內閣總辭，伊藤博文拜命組閣。伊藤是日本一代權臣，積極優華的急先鋒。申午中日之戰，清軍大敗，清廷喪權辱國，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即由伊藤脅迫李鴻章所訂定。所以伊藤上台之初，首即電今日據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飭以下列三事：

- 一、嚴禁資助中國革命黨。
- 二、台灣貯存軍火，絕對不許出口。
- 三、嚴禁日本軍官佐士兵，為中國革命軍效力。

至此，中山先生發動惠州起義的一線希望，也宣告破滅。他受到接二連三的深鉅打擊之餘，仍惓惓以前方革命將士為念，所以他盡傾囊

中所有，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率領同志數人，由台北馳赴香港，再由香港繞道、海豐而三多祝，傳達如次的一道命令：

「日本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總司令自決進止。」

當時，粵中革命志士，風起雲湧，紛紛投效革命軍，使鄭士良所部勢力，日益壯大，惠州起義軍迅速擴充達二萬餘人，不僅華南大震，遠在北京之清廷亦為之阢隕不安。在兩廣總督滿人德壽的奏摺之中，即可詎知清廷、清吏恐慌情形之一斑：

「……伏查逆首孫汶（筆者謹按：清廷清吏行文每於中山先生名旁加三點水），以漏網餘凶，遊魂海外，乃敢潛回香港，勾結惠州會匪，潛謀不軌。軍火購自外洋，煽誘遍及各屬，暨旗叛逆，先擾逼近租界之沙灣墟，意在挑起中外釁端，從中取事。其凶險詭譎，實與康梁逆黨勾結長江兩湖會匪同時作亂情形（按指康有為、梁啟超保皇黨所發動之庚子漢口之役，實則由唐才常主其事），遙遙相應。雖官軍乘其未定，先予兜截，使兩路之匪不能聯成一氣，歸善之匪未能竄越一步。然猶家突狼奔，橫厲無比，戕殺弁勇，擄捉印官，各路會匪仍敢同時並舉，雲集響應……」

山田良政一行奉中山先生之命，經香港轉折抵達三多祝，將中山先生手令帶到前線軍中。二萬餘同志獲訊，如同晴天霹靂，人人傷心失望，目眦幾裂，拔劍擊石，憤呼之聲盈野。領導份子舉行會議，幾經討論，方始通過了如下的一項決議：

「廈門既不能行，不如沿岸退出，渡海再返三洲田山寨。設法自香港購入彈丸，復向西北，集新安、虎門之同志，一氣陷廣州城，以符號令！」

同志們雖仍志切匡復，氣吞河嶽，終究格於現實環境，軍無資糧，彈藥不繼，英雄無用武之地，迫不得已，唯有宣告解散。惠州舉義以台灣為根據，四戰全勝，革命軍陣歿者僅四人而已。此外則有傳達 中山先生手令之日人山田良政，完成任務折返香港，途中迷路，不幸被清吏擒殺，這是外國志士為中國革命犧牲性命之第一人。

中山先生首次來台一住月餘，惠州起義失敗不久，有一天，日據台灣總督府派了一名官員，來到新起町 中山先生的住處。當時 中山先生和日本友人平山周均在座，來人彬彬有禮的鞠躬致意說：

「由內地拍來了電報，要我們把革命黨人一概驅逐出境，所以我現在特地來訪，請你明天就乘船回國。」

言訖，奉上日據台灣總督府致贈的程儀一百元，來人告辭，中山先生當時已無法返回國內，唯有冒險北上，先到東京，徐圖再舉。這一次東渡相當不易，因此，當 中山先生抵東京之日，致函日本友人平山周時，一開頭便說：

「弟已平安到東京，得見各同志矣！」

民國二年兩次來台

民國二年 中山先生二次旅台之行，時至今日為止，一般都說民二 中山先生僅祇赴台一次，其實這是不正確的。據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

史編纂委員會合編之「國父年譜初稿」上册，頁三六四，綱目：「十一月杪，先生自上海至台北」條下，記載 中山先生二次台灣之行，原文如次：

「初，先生以寧滬方面軍事無望，乃乘德國輪船離滬南下，擬赴香港轉粵，指揮軍事。船抵福州，有日本福州領事館武官大佐多賀宗之往謁，言廣東方面軍事失敗，陳炯明逃往南洋，岑春煊且為香港政府扣留，先生尤為危險。先生初尚不信，多賀以所得電報證實，並謂適有信濃丸泊此。船長郡寬四郎，為其摯友，可秘密乘此船赴台灣，轉渡日本。先生感其關切，從之。時與先生同行者為胡漢民、李朗如、梅光培諸人。乃囑李、梅等赴港，獨與漢民渡台。並謂梅曰：『君由美國萬里歸來，志切革命，去國日久，人地生疏，錢財不可不多帶。』盡以所存六百餘金子之。多賀大佐囑郡寬船長謝絕中國乘客，立即啓行。十一月杪，抵台北。（原註：鄧慕韓原稿記總理二次革命失敗由閩赴台事。所記贈金係據李朗如所述，其餘據宣野長知所述。——筆者按：宣野長知是一位日本志士，時在日本，曾在神戶登輪秘密迎接 中山先生。）同來者尚有日友村田省藏。當由日駐台總督派員接待，行館為台北御成町（即今中山北路——原註。）梅屋敷（今日國父史蹟紀念館——原註。）先生此行因日人警衛森嚴，故知者甚鮮，惟在台黨員翁俊明曾親謁請示，並為日人大和宗吉書『博愛』二字，藤井悟一郎書『同仁』二字。先生旅台期中，曾遊赤嵌樓、吳鳳廟、日月潭諸名勝。（原註：新

生報資料室：『國父蒞台史實』。）

上列一段記述，矛盾之處甚多，諸如：

一、謂 中山先生此行係因寧滬方面軍事無望。則上海討袁軍早於八月十三日即已失敗，黃興尤於七月二十九日撤離南京，搭船直駛日本。距年譜所載之十一月杪，已逾三個多月之久。二次革命之役的最後軍事行動，係熊克武在重慶宣告獨立後，熊部於九月十二日被川（王陵基）、黔（黃毓成）兩軍擊潰。二次革命癸丑討袁之役，至此宣告全部結束。袁世凱乃宰制全國，為所欲為，九月六日威迫國會，選其為正式總統，九月十五日以北京總檢查查官名義，通緝 中山先生及二次革命首要。十一月四日袁世凱復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其目的在於撤銷國民黨籍之國會議員，使參眾兩院開會不足法定人數，而為事實上的解散。對於 中山先生個人安全，並無若何直接威脅。

二、謂 中山先生擬赴港轉粵，指導軍事，尤屬不符事實。因為七月十八日，廣東都督陳炯明，奉 中山先生之命，宣佈獨立，準備出兵援贛。袁世凱立即重賄駐防梧州（蒼梧）之濟軍統領龍濟光，於七月三十日率部東下，進襲肇慶，並飭袁氏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等，斥資收買粵軍全部，計為鍾鼎基、蘇慎初兩師，暨張我權旅。八日四日粵軍公開叛變，汪兆銘、陳炯明倉皇奔港轉赴南洋。廣東討袁軍事到了二年八月初即已停止行動，何至於要等到了十一月初，方由 中山先生前去親自指揮呢？

三、中山先生過福州，既為指揮軍事而去

，焉能僅爲有感於日本武官多賀宗之的關切，便中止行程，改道赴台？何況，民國二年十一月間，袁世凱已爲正式總統，國會形同解體。國民黨黨員迭遭迫害殘殺，除一個半月前的一紙通緝令外，對中山先生並無任何重大威脅。至於中山先生要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赴廣東，尤其更不合理。廣東時有龍濟光任都督，授振武上將軍，受袁收買的粵軍叛將蘇慎初，且經袁授以勳三位，晉級上將。爲此當時出任司法總長的梁啟超，曾上書反對說：「此種懣賞，實覺太濫。……且蘇本一浮薄小子，在將弁學堂一年畢業，辛亥軍興，偶乘時運，忝居師長已爲過份，猶得曰『亂黨之亂命』。今中央遽以至崇之階予之，毋乃啓人民僥倖之心，而覺中央名器之不足貴乎？」中山先生若在十一月杪到廣東去，才真是危險之至呢。

三、民二，孫中山先生來台，下榻何處，說法共有下列四端：

1. 年譜說：行館在台北御成町梅屋敷。

2. 黃師樵說：中山先生抵台共住月餘，住於大稻埕李春生大樓，由美最時洋行買辦吳文秀負責接待。

3. 陳義芬說：中山先生抵台曾任台北市石橋仔頭高蘭家中，曾四次接見陳父捷陞，伯父陳秋菊。二、三兩說與年譜說所載，「惟在台黨員翁俊明親調請示」一節又不相符。又說中山先生住高蘭家係於第一次來台時。

4. 劉金謂說：民二中山先生來台，曾邀同志三人，在頂北投櫻川閣旅社休息一星期。

其中顯屬矛盾的一點是，中山先生來台既有日本駐台總督派員接待，就決不會在私人家中作客。

四、據梅屋敷主人之一的藤井悟一郎向台灣省黨部報告：民國二年中山先生來台，僅在梅屋敷就擱幾個小時，陪侍者亦僅日人村田省藏一人而已。在梅屋敷進午餐後，曾題字二幅，到庭園中散了一會步，由攝影師攝影數幀，旋即匆匆離去。這和上說的一住月餘又截然不符。甚至於連中山先生曾赴新北投公共浴場沐浴，由陳廣才廚師治餐，以及現仍保存的那只浴盆，亦將全部推翻，不能成立了。

五、根據民國三十九年雙十節時，猶仍健在的陳廣才說，民二中山先生來台，他記得孫先生穿全套白色學生裝，以季節言，應該是在夏季或秋初。另據梅屋敷女侍村上百惠，主人大和宗吉、藤井悟一郎，三人的記憶，則中山先生穿的是黑色西服，照說，那就應該是在冬天。

由於上列的這許多矛盾說法，多年以來無人詳加考證，一一予以解答。因而使中山先生來台幾次之論，人言言殊，却又一概未能自圓其說。台灣光復已歷三十年，此一台灣最光榮之史實，猶未能查證其真象若何，無可否認的是爲一大遺憾。

筆者就各家之說詳加對照，如日人井上佐太郎記多賀宗之談話，與中會老同志暨中山先生小同鄉楊心如所稱各節，乃至大和宗吉、藤井悟一郎、村上百吉、陳義芬、陳廣才、劉金渭等氏的綜合回憶。參證邵元冲、戴傳賢、胡漢民、

陳少白、陳固亭、程天放、黃季陸、鄒魯、劉成禹、鍾工宇、黃純青等諸氏懷舊憶往之作，斷定中山先生在民國二年，曾經一連兩次來到台灣。一次係在八月四日或五日，一次則在年譜所謂的十一月杪。

鍾工宇，廣東中山人。十四歲抵火奴魯魯，進入意奧爾尼學校。兩週後，中山先生入學，鍾氏乃與中山先生相交莫逆，後即不時聚晤，成爲與中會早期會員之一。一八八九年，鍾氏返國，與中山橋頭鄭氏夫人結婚。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鍾氏偕夫人訪日，聽說中山先生正在長崎，立往訪謁。中山先生欣然邀約鍾氏夫婦同往參觀三菱洋行長崎造船廠，下午同返旅邸。其後鍾氏曾發表英文的 *Dr. Sun Yet-Sen, My Schoolmate and Friend*。其中有一段詳細記載三月二十三日之事，中山先生接獲宋教仁遇刺消息時，鍾氏夫婦正好和他在一起——茲予彙譯如次：

「那天下午同時帶給中山一個令人傷心的消息：宋教仁遇刺，宋是中山最信任的左右手之一，謀殺地點係上海北站。中山決定縮短他考察日本鐵路、工業的日程，當晚乘日本天洋丸返滬。輪船公司對中山優禮有加，供應最佳設備，及一專用餐廳。我和內人也很榮幸的與中山同桌進食。

「三月二十五日抵達上海，中山方知本黨同志決定倒袁。我的表兄時任京滬鐵路局長，他在郊外一所高貴的俱樂部設晚宴爲中山洗塵。可是中山與唐紹儀因舉行重要的政治會議，因

而不克參加。——此為二次革命前夕，中山先生過返上海的一段珍貴史料。

與 中山先生相處甚久的美國駐非巡迴法官

林百克 (Paul Linebarger) 著：「孫逸仙傳記

」第八時期，「臨時總統後之亡命」(一九一三

——一九一六年)一段中載稱：「一九一三年九

月(即民國二年八月。——筆者註) 中山因起

兵討袁，為上海領事所請，離開上海。……他

同領事團議定以後，就乘了一隻德國輪船。目的

預備到廣東指揮討袁軍事。但是在這個行程中，

輪船先進福州港，因卸貨就擱到了廣東的行程。

因此他已來不及到廣東指揮戰事，而廣東討袁軍

已失敗，都督陳炯明逃至新加坡。香港政府又下

令搜捕 中山，困難益增，虧得日本領事發給護

照，他於是在福州轉船到了台灣。到台灣後換乘

日本輪船到日本門司，再到東京。」

除了若干細微末節以外，筆者認為，林百克的

記載是比較符合當時實際情形的， 中山先生係

於民國二年八月初由滬入粵不成，而後轉台抵日。

夏冬兩季各來一次

林百克說 中山先生「為上海領事所請離開

上海」，確有根據。二年七月十六日革命軍推陳

其美(英士)為駐滬討袁軍總司令，陳氏在同月

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兩天，兩度率眾猛攻上海製

造局，不克，以鈕永建代。二十八日鈕氏分三路

進攻，又以眾寡懸殊不支敗陣。同日深夜，黃興

以北軍雲集，南京陷於重圍，偕代理都督事章梓

易服出城，登輪直放日本，京滬兩地的革命軍事

，俱告中輟。早在黃興入南京(七月十五日)舉

兵討袁，陳其美被推舉為駐滬討袁軍總司令(七月十六日)之際，上海紳商苟且偷安，即已開始向南北二軍要求罷戰。

紅十字會會長沈敦和，前清時代曾任山西道

台，因婉拒八國聯軍入山西，而被三晉百姓譽為

「朔方生佛」。此人在國內素孚人望，滬上紳商

便推舉他為代表，沈氏曾數度晉謁陳其美總司令

，極力懇請陳將總部自南市移往閩北。陳總司令

曾義憤填膺的說：「要我遷移總司令部，除非我

與敵軍戰至全無一兵一彈始可！」

不過，陳其美在兩度進攻製造局受挫後，仍

然體卹民情，把他的總部搬到閩北去了。及至革

命軍在上海、南京兩地連續挫敗，袁世凱聲勢一

振。一向袒袁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便運用其

影響力量，一面下令香港總督府嚴防「亂黨」，

逮捕 中山先生。一面使英國駐滬總領事促領事

團採取防範行動。於是，七月底，上海領事團轉

飭會審公廨，暨兩租界總巡捕房諭拿「亂黨」黃

興、李烈鈞、柏文蔚、陳其美、鈕永建、居正、

駐京福字營司令劉福彪(劉親自率部來滬助攻)

等。然後再由工部局發出告示，驅逐孫文、岑春

煊、及上海商會董事李平書、王一亭(李王係陳

其美委任之保安團正副團長，負責管理戰時民政

，維持治安。)至此，自 中山先生以次，上列

名單之內的二次革命首要，全部離滬他往。中

山先生之離滬，尚且在上海領事團報過備。由此

可證， 中山先生離滬入粵，過閩轉台，係在八

月初，而決非年譜所記的十一月杪。上項考證，

與多賀宗之的追憶往事紀錄，大致脗合。(多賀

追憶之作暨中山先生二次滯台經過詳後。)根據

國父年譜初稿」所記， 中山先生自三月二十五

日自日本抵滬，以迄所謂的十一月杪乘德輪南下

入粵，足足有七個半月留在上海，這一點就當年

情勢而言幾乎是絕無可能的。尤以七月底八月初

京滬贛湘皖粵閩各地討袁軍事，相繼失敗。黃興

、陳其美……等等二次革命首要全部走避一空

，難道說還會把革命領袖 孫中山先生隻身留在

上海，再苦撐三個月多？這簡直是匪夷所思，不

可想像之事，因而筆者可以斷言，在此一時期的

中山先生行蹤，必有闕漏，殆無疑問。

追隨 中山先生甚久，在同盟會中有「師爺

」之稱的鄧慕韓氏，於民國五十一年 中山先生

誕辰紀念，在台北中華日報發表：「追隨 國父

之回憶」一文，其中有謂：

「癸丑(民國二年——原註)二次革命將起

， 國父會到澳門，約陳炯明往會。余在廣州聞

之，急往澳門。至則已赴港。急轉到港，則

國父又已轉輪赴滬，輪中僅匆匆數語而別。」

鄧慕韓是 中山先生極親密的同志之一。民

國三年， 中山先生曾函促鄧赴日相隨，可見得

他是和 中山先生經常保持聯繫的。鄧氏既謂

中山先生為策動廣東獨立，曾赴澳門一行，召見

陳炯明，他尚且從廣州，追到澳門、香港，終在

由港赴滬的輪船上，和 中山先生匆匆見了一面

，這一段事實當然可信。計算時間，必定在五月

二十六日國民黨策劃討袁以後，八月三日 中山

先生離滬南下以前，而這一段經過，却又是年譜

隻字未載的。(未完)